

跨越讲台与岁月的师生情

王敬芬

每年教师节,我都会准时给陈老师打去问候电话。听筒里传来她依旧温和的声音,一瞬间就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校园。

那时,她是我的政治课老师,我们的交集起初也不过是校园里偶遇时的几句寒暄。青春年少的我总忙着赶课、赴约,从未想过这位笑意柔和的女老师,会成为往后岁月里两次托住我人生风浪的人。

第一次是母亲重病、离世的那段日子。我接连缺了她好几节课。与她交往的增多,就是从那次联系补考事宜、发送邮件沟通开始的。我原本以为,一位非主课老师能把考试时间、复习要点交代清楚便已是尽责,可她的邮件末尾,却多了好长一段柔软的话。她说自己的孩子比我大几岁,完全能体会到我此刻的痛苦,等我返校后,要是想找人说话,随时可以去找她。那几行字像一缕春风,轻轻抚慰了我痛失母亲的伤痛。补考结束后,我还需要补交平时的作业。那次我去给她交作业时,与她有了一次长长的深谈。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两个女人,在我刚刚失去母亲的至

暗时刻,仿佛生出了一层近乎母女的共情联结。

毕业后的好些年,我们的联系只停留在教师节和春节的短信问候里,我以为这份师生情会慢慢淡在忙碌的日常里,直到我的婚姻走到了悬崖边。作为从小被父母和两个哥哥宠大的老小,我早已习惯了被人捧着、让着,却在柴米油盐的婚姻里攒满了委屈,和丈夫的矛盾、和婆婆的隔阂,像一团乱麻缠得我喘不过气,满脑子只剩“离婚”两个字。走投无路时,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老师的电话。

那天我在她家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,从和丈夫相识相恋的甜蜜,说到后来日常相处的怨怼,连那些最细碎的婆媳矛盾都一股脑倒了出来。她就坐在我身边,安安静静地听,没有打断,没有评判,直到我所有的情绪都倾泻干净,才轻轻叮嘱我:“不要仓促做离婚的决定”。她没有指责我的任性,只是慢慢跟我说,婚姻里最不能忘了“付出”两个字——别只盯着自己受的委屈,也要看见对方藏在日常里的奔波和退让。

那两个字像一道微光,

忽然就点醒了我。我第一次跳出“被疼爱”的惯性,看见丈夫这些年为这个家默默扛起重担,看见自己那些脱口而出的埋怨里藏着多少理所当然的索取。后来我又好几次去找她聊婚姻里的相处细节,她每次都耐心听我梳理情绪,帮我把拧成结的思路一点点捋开。是她的那句“等一等”,给了我喘息和反思的空间,让我没有在冲动之下撕碎自己的家。如今我和丈夫早已重归于好,和婆婆的相处也慢慢找到了舒服的节奏,孩子也考上了大学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陈老师的劝慰,我的生活很可能会是一地鸡毛。

今年教师节的电话里,我对陈老师说,您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。可她却笑着说,“现在很多新东西我都跟不上,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”。那一刻我忽然红了眼眶,原来这么多年,她不仅在我跌倒时伸手扶我一程,更用这份始终谦逊的人生态度,悄悄为我树立了从容老去的榜样。从一堂政治课的师生,到跨越二十岁的挚友,这份情早已经越过讲台和岁月,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。

高三班主任的幸福哲学

早上6点15分,准时上了电梯。碰到了熟悉的邻居,她惊讶地问,怎么比上学期走得还早?我笑笑说高三了。他们同情地说,“这也太早了,高三太辛苦了。”我还是笑笑,和他们说了再见。

从教几十年了,很多事只能自己消化,很多情绪被擦去。不过,对于教学和班主任工作,我从来没有吝惜过一句。课堂是我的主阵地,班级是我的管理场。我在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,自由驰骋,用心耕耘,滔滔不绝甚至口若悬河,以真诚的用心和孜孜矻矻的钻研浇灌着

一届又一届学生。哪怕嗓子已经嘶哑,“我也应该用嘶哑的歌喉歌唱”。

我收获着小小的幸福——当备课有新的发现,当课堂有碰撞的生成,当学生解除了疑惑,当他们笨拙地表达对我的喜欢。教师节一个学生送我信,说“是她人生路上的菩萨”;毕业多年的学生截屏学校表白墙上的话“崔老师让语文变得更美丽”;已经为人父母的学生多年后突然建了群,然后纷纷祝我教师节快乐,还包括当年那位被我严厉责骂过的女生……

以微光赠予他人,终会被

崔世俊

世间温柔照亮。

然而,于高中老师而言,幸福是概率,辛苦才是日常。教学是个良心活。工作越久越体会得到,年龄越长越不能、不敢、不允许自己昧良心。因为我的职责是育“人”,不是管“物”。

为人师表,心存敬畏,更要多去爱,去体谅,去给予,去付出。人生漫漫,多给予才能多幸福。就像歌里唱的“我把我唱给你听,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,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”。

路途遥远,我们幸福前行吧。

难忘四十年执教生涯

赵培楼

1954年9月,我执起教鞭走上三尺讲坛,到1994年10月正式退休,整整四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。如今青春早已远去,却仍能借着回忆的脉络,追寻那段闪光的岁月,重新触摸奋斗年代里每一份收获的喜悦。

1958年,我告别了少先队工作岗位,正式转做小学语文教学,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当时读到北京小学教师刘厚朴的文章《小学作文教学》,文中提到要通过课外阅读丰富学生词汇,开阔他们的思路与眼界。我便主动联系了青岛台西图书馆的赵馆长,约定每星期选派六名学生到馆里协助修补破损图书。这样一来,孩子们获得了免费阅读和优先借书的机会,馆里大量破损的旧书也在孩子们手下得到修复,真正是两全其美,这件事当时得到了学生和家長的一致欢迎。

同校的杨振樑老师在语文作文教学上颇有造诣,我便常常虚心向他请教作文评讲课的设计思路,还结合自己的教学做了初步的改革尝试,最终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。过去的作文评讲课大多是教师一人说教,学生听得兴趣寥寥,我试着改成了师生互动的形式:每次作文收上来后,我会挑选15本左右的典型习作做详细批改,加上眉批和尾批,刚好够支撑一节评讲课使用。评讲课开始前,我会提前把这15名学生叫到身边,告诉他们上课时上台朗读自己作文里被红笔圈点的章节。讲到开头精妙、结尾有力、中间的心理描写或环境描写出彩的段落时,就让对应的学生自己念出来,之后我再带着全班一起分析。被点到的学生心里美滋滋的,台下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,个个都跃跃欲试。

作文教学只讲不练终究是空头理论,我还尝试选用当时《少年报》上每期连载的漫画“小虎子日记”,布置学生要么写自己的日常日记,要么把这幅漫画改写成完整作文,之后再择时集中评讲。这些作文教学里的点滴尝试,当年也得到了朝城路小学领导的肯定。

回顾过往四十年的从教时光,我的幸福与快乐几乎都来自“教师”这一职业带给我的馈赠:是孩子们举着作业本围在身边的喧闹,是作文本上越来越多的亮眼佳句,是多年后街头偶遇时,早已长大的学生那一声清亮的“老师好”。